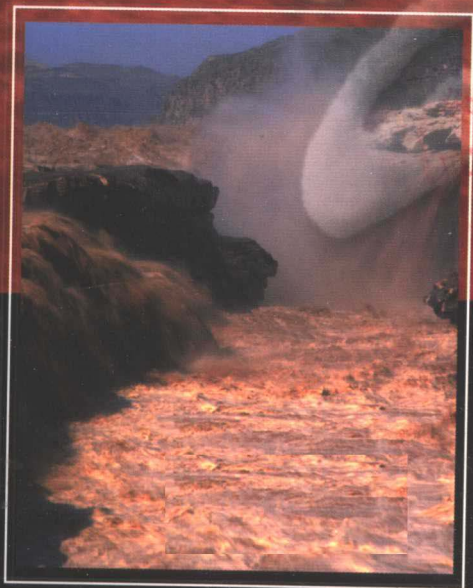


JINGSHEN ZHONGYUAN

●刘增杰 王文金 主编

●河/南/大/学/出/版/社



精神中原
——20世纪河南文学

精神中原

——20 世纪河南文学

刘增杰 王文金 主编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神中原:20 世纪河南文学/刘增杰,王文金主编. 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2002.12

ISBN 7-81041-969-2

I. 精… II. ①刘…②王… III. ①现代文学-文学研究-河南省②当代文学-文学研究-河南省

IV. 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7422 号

责任编辑:袁喜生

责任校对:何 蛟

装帧设计:刘广祥

出版:河南大学出版社

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(475001)

0378-2865100

发行:河南省新华书店

排版: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室

印刷: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开本:890×1240 1/32 插页:1

版次: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: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527 千字 印张:21

印数:1—3000 册 定价:38.00 元

中原文化圈与 20 世纪河南文学(代序)

刘增杰

中原文化圈:跨时空的地域组合

地域是人类的空间组合。特定的地域,有着人类不同的活动形态,不同的地理特征,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向,不同的行为系统。地域是物质的,也是精神的。不同的气候、土地、动植物分布、物产资源,产生不同的劳动方式、生活方式、风俗风情、审美意向,给文化、文学刻下了地域印记。这些都会在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细部描摹中呈现出来。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河南文学,通过对作品文化生存环境的细致考察,研究对象在我们面前就会迅速地飞扬起来,生动起来,水到渠成地切入研究对象本体,清晰地体味到作品特有的“中原味”,美学意蕴。

中原文化圈是历史的概念。在先秦时期,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,中原文化以其特异的光彩向四周辐射。汉唐时期,中原文化仍带着鲜明的本土文化中心地区的色彩,东与齐鲁文化、南与楚文化、北与燕赵文化、西北与三晋文化相映并辉。南宋之后,由于战乱频仍,文化南移,地处中原的中原文化才日趋萧条、冷落,甚至衍化为一种带有边缘意味的文化。中原文化原来所具有的先锋文化特征,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。

中原文化圈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地域。古称中原为天下之中，豫州为九州之中。狭义而言，中原文化主要指河南地区的文化；广义而言，则泛指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；甚至也有人用中原文化来概括整个黄河流域的文化。有时，人们还把北方与南方相对，用中原来泛指北方。姚雪垠在谈到《长夜》时说，“作品写的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侧面，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，也许还包括陕西、陕北、鄂西、皖西、皖北、鲁西、冀南等广大农村”^①。姚雪垠所列举的一些地区，实际上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原和北方。本文所指的中原文化圈，与姚雪垠的上述看法是近似的。

总之，中原文化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时空。中原文化有时超越为一种象征。它像黄河、长城这些名字一样，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，生命意识的复活，奋斗精神的延续。作为一种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古老文化，中原文化的变革既有迹可寻，它的一些稳定性特征也远未消失，并且永远不会泯灭。华夏民族最早的文化思维和生存观念，至今就仍然和中原人的现实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这些，对中原作家的创作，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，暂时的，无关宏旨的，而是根深蒂固的，鞭辟入里、入木三分的。从人生哲学、审美情趣、艺术思维方式，乃至题材选择、语言运用等方面，中原文化都给予了作家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。

两大创作母题

对苦难的抗争与对中原文化的反思，构成了 20 世纪河南文学的两大创作母题。

从古代到 20 世纪上半叶，发生在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争，

^① 《姚雪垠书系》第 12 卷，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第 299 页。

对中原文化结构的破坏是灾难性的。战乱使田园荒芜,人民流离失所,走向生活绝境。征战的烟尘给中原留下的是血和泪痕,战车和马蹄的辙印,消失的是文化和支撑人们前进的文化精神。荒芜使中原地区供养生物潜力受到限制。供养力无法满足生物的消耗,生物群难以稳定生存。苦难中的中原,书院等文化设施横遭破坏,人们的文化素质日益下降。战乱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文化南移。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,如晋祚东迁,宋室南渡,蒙古灭金,清兵入关,都造成中原文化的大迁徙,人才和财富尽流东南。近代,日本发动侵华战争,中原知识分子星散,又形成了一次新的现代文化逃亡。

苦难制造了愚昧,愚昧又恶性循环地加重了苦难。20世纪河南文学,真实地再现了中原人民生存处境的险恶。五四作家徐玉诺在短篇小说《一只破鞋》中,记录了一个勤劳、善良的农民,穿着破鞋给在开封上学的孩子送钱,在返回家乡的路上被土匪残杀的故事。冯沅君的小说《劫灰》,描写了遭受土匪蹂躏的农村的凄惨景象:土匪过后,这里留下来的,只是“无数的劫灰”。尚钺的小说集《病》、《巨盗》,创作态度严肃,取材广泛,如鲁迅所说,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怎样在生活线上挣扎。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,为了供儿子上学,被迫卖淫,而自己又感到十分羞愧,最终用一条麻绳缢死在树上(《洗衣妇》);家住罗山的一个农妇,别人靠着官府的势力,强占了她家的房子,又将她的儿子毒打一顿关押了起来。她的丈夫气不过,跑到信阳去告状。而此时,恰恰碰上军阀在信阳打大仗。由于丈夫没有音信,农妇思挂丈夫的安全,坐卧不安,屡受折磨,凄惨而死(《谁知道》)。李根一家,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,处于死亡的边缘。饿火“如毒蛇似的在他肚中缠绞着”,“孩子在床上扯着干哑的喉咙,哭着,叫着”,“女人在绝望的啜泣中呻吟着”,他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在床上用咒语般的言词向他求东西吃。生活逼得李根走投无路。他走到街上偷了一块面包,

结果竟被警察捉去,用尽一切酷刑逼他承认是“巨盗”,加以处死(《伏法的巨盗》)。短篇小说《雾的晨》,师陀以他惯用的抒情彩笔,精确地画出了一幅农村雾景:在雾中,整个乡村呈现一片和平宁静的气氛,一切都好像浸在鲜牛奶里。然而,作者却告诉人们,正是在这雾中,穷得连半瓢米都借不来的农民,为了爬到树上采摘一把杨树叶充饥,却被无情地摔死在地上。在这里,迷人的晨雾的描述不是为了粉饰现实,用一幅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“农家乐”来欺骗读者,而为了使景物和人物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,向吞噬农民生命的旧社会发出谴责。而姚雪垠在《长夜》中,则为我们画出了一幅逼真的河南荒村图:“从平汉线的驻马店通往南阳的三百里官路已经荒废,常常有枯草埋没着深深的车辙。官路旁的村落大半都成了废墟,剩下些烧红的墙壁映着蓝天。井沿上围着荒草。碾石上长着苔藓。有的村庄还没有全毁,但大部分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门窗,主人不知道哪儿去了。”这段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文字,通过对官路、村落、井沿、碾石的精确描绘,不仅隐约地预示了作品中的人物将在怎样的历史氛围中活动,而且真切地表现了20年代中期,在官、匪蹂躏下中原地区人民所蒙受的深重灾难。

不甘于苦难生活的河南农民,对命运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抗争。从师陀的短篇小说集《谷》、《里门拾记》,到姚雪垠的《差半车麦秸》、《牛全德与红萝卜》、《长夜》,直到李準的《黄河东流去》、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、王钢的《天地玄黄》,一脉相承,几代中原作家一直在探寻、发现、赞美潜藏在河南人民身上的原始生命力,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河南人率直、粗野、豪爽、侠义的性格,硬汉精神。他们决心结束苦难命运的果敢行动,构成了中原文化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和雄厚基础。

当然,比较而言,侧重反思20世纪中原精神的作品,显得更具审美价值和历史深度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固有的中原文明,是烂熟了的中国农业社

会后期的惯性运行。在这里,时间似乎已经凝固。在师陀的《果园城记》^①里,我们看到:果园城的朱魁爷,还是这个中原小城的无冕之王。他在小城里不担任任何公职,可是,“每任县官在上任之前,当他还没有功夫拴束行李的时候,他在省里就先有了数目,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望魁爷”(《城主》)。魁爷在果园城下了一面神秘的网,把各种各样的无赖、痞棍、地主,安插进各种机关,自己则恩威兼施,充当果园城真正的主人。两家农民为邻,他们为一棵小树的所有权打过无数次架,打得难解难分,他们找魁爷公断。结果是,受到了魁爷兜头一阵臭骂,每位农民已经在果园城住了两个礼拜,花了比那棵小树多过30倍至60倍的钱。果园城孟林太太的女儿素姑,这位寡妇的女儿,她从12岁起就开始给自己缝绣嫁衣,绣满了一大口箱子又一口箱子,如今,她已经绣到了29岁,在闺房中慢慢憔悴。箱子里锁着她无数的岁月,锁着这个嫁不出去的老处女的青春。像葛天民、贺文龙这些生活于小城的知识者,无论他们怎样地努力挣扎,他们都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。对于他们来说,命中注定的是,要么在小城中得过且过,一事无成,像葛天民那样麻木地自满自足下去;要么是设法走出小城,逃离中原。包括师陀在内的果园城的知识者,走的多是后一条道路。知识者个别或集体逃亡的结果,使果园城一类的小城,甚至包括中原的一切城市,日益蜕化为一片文化沙漠。果园城系列小说关于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描写,隐含着这位现实主义作家对于改善中原地区文化环境的沉痛呼吁。

阅读李準的《黄河东流去》,我们不可忽略春义和风英这对在水上举行特殊婚礼的情侣。在黄水滔滔的大灾大难中,他们相依为命,相亲相爱,他们当时在精神上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。饿着肚子,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春义和风英,夜晚“他们凭着互相靠近的

① 《果园城记》,短篇小说集,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。

一点体温抵御着夜风的寒冷”。跑到咸阳,在自己的饺子铺开张以后的日日夜夜里,凤英因为自己的辛苦经营获利,兴奋得眼睛闪光,而春义对于做生意却完全不能适应。为此,他们之间经常闹气。当听说黄河口子快打住的时候,春义对李麦说:“婶子,黄河口子快打住了……我想着,月亮光再亮,也晒不干谷子,外乡再好,也比不了咱家乡,千行百行,种庄稼才是正行,我是想回乡……”

对于远离故土的游子,故乡是心灵的慰藉;对于离乡背井受尽磨难的黄泛区农民来说,故乡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归宿。但是,这只是总体而论。对于春义来说,回乡情结中也烙有着中原文化小农观念的印迹。以犁耕文化为物质基础,带有小农经济特征的中原文化心理结构,具有超稳定性的文化心理倾向,在心态上的突出表现是知足常乐的内向性,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恋乡恋土情结。他们把一家人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在自己土地上的劳作,生活清苦却能够四世同堂,乃至五世同堂,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。他们缺乏改变这种世代袭承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性,他不愿意闯荡世界,对外部世界下意识地产生着一种厌恶感、恐惧感。面对都市文化,商品经济,他们心情焦躁,手足不安。他们看不惯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手段,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。保守的防御性的消极心态,使他们只能从都市中败下阵来,躲进几千年来中原文化给他们营造的那个破草庵,过着节奏缓慢、几近停滞的病态生活。春义和凤英的争论,不是个人品质和感情问题。他们双方对方都有着足够的谅解和信任。他们的分歧在于:凤英在实践中感受到了原有生活方式的落后性,她再也无法忍受农业文明对于个性的压抑和钳制;在都市里她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,她向往投入这种生活,哪怕再苦再累,她也要进入竞争的市场一显身手。她在都市里、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尊严,她要靠自己的头脑、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赚钱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春义还完全没有跨越旧有的农业文明的版图,而凤英却果敢地走出了传统中

原文化的消极阴影。虽然她跨越的步子还并不大,但生活会指引她继续前行。

这对爱侣的分手,有着固有中原文明在新的文明撞击下蜕化、裂变的意味。李準塑造的这两个人物,包含着他对中原文化的哲理性反思以及对更新中原文化的期待。

如果说《黄河东流去》、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对中原人固有观念的反思还只是一种信号,那么,张宇、田中禾、刘震云、李佩甫等人的一些作品则具有实质性突破的意义。文学反思的程度,反映着中原人思想攀升的境界达到的高度。人们对此应保持足够的关注。

艺术魅力来自民间

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河南作家,虽然创作个性千差万别,但他们的艺术资源却主要来自民间。他们和民间(主要是农民)、民间艺术保持着血肉联系,自觉地或下意识地担当着中原文化民间传人的重要角色。

质朴的民间生活使他们获得创作灵感,产生创作冲动。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创作的成功,就受惠于作者对故乡生活的熟悉以及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。读初中时,姚雪垠被土匪捉去,被迫过了百天绿林生活。这段生活,不仅导致他创作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长夜》,而且如他自己所说:“我在写《李自成》时,取自《长夜》中的生活经历不少……《李自成》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,可以在《长夜》中找到影子或原型。”^①“当然,我的感性认识不限于《长夜》中所写到的,许多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河南家乡所耳闻目睹的生活片断

^① 《姚雪垠书系》第12卷,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11页。

都成了有用的素材。”^①甚至姚雪垠小时候常听说“古今”的牛屋，他也成功地把它化入《李自成》中。我们不妨把回忆录和《李自成》中的描写放在一起加以比较：

姚雪垠在《〈李自成〉创作余墨》中回忆说：“从前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听老人说‘古今’，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在那个回想起来已经十分遥远的时代，如果是稍微太平年景，冬日农闲，天寒地冻，常常在邻家牛屋中有许多人围着一堆火，坐在草墩或土坯上，吸着旱烟袋，听一个人说‘古今’。门关着，屋中光线很暗，燃烧的树根疙瘩冒着红火，也常常冒着烟气，呛得人咳嗽。黄牛卧在地上，慢屯屯地倒沫，挂在脖子上的大铜铃偶尔响动，但人们谁也不去注意它，也没人注意到屋外呼啸的狂风，而是被‘古今’吸引住。”在《李自成》里，儿时的印象幻化为：“牛屋中的当门地上烧了两个树根疙瘩，冒着烟，呛得人们不断咳嗽……小石槽上仍像往年一样贴着一张红纸条，上写着‘槽头兴旺’。田见秀和他的两名亲兵背靠石槽，挤在老百姓中间，面对火堆，也是被烟熏得直淌眼泪。他面带着微笑，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头子在读刘伯温的诗。”这俨然就是姚雪垠小时候听“古今”的邻家牛屋。作家把生活经验和创造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，原始的生活积累变成了有声有色的艺术场景。

师陀的创作也同样得力于民间艺术、民间文学的滋润。和姚雪垠略有不同的是，姚雪垠是蹲在牛屋中听说“古今”，师陀则是跑到城隍庙去听说书。师陀在杞县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下午，他在城隍庙的月台下面，总可以看见一个中年的说书人。说书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长衫，贫困挂在脸上，显得又黄又瘦，面前放着从庙祝那里租来的一张断腿板桌，周围和两旁放着几条板凳。说书人自己仅有的，只是一把黑色的折扇，一块惊堂木，一个收钱用的小

^① 《姚雪垠书系》第12卷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10页。

筐箩。每天下午放了学，师陀总爱跑到城隍庙去。挤在一群听众中间，入迷地听说话人说评话。说话人用他那把万能的折扇打刺砍劈，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，这些，把少年师陀带到了遥远的历史氛围之中。从说话人那里，他了解了《水浒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施公案》的故事，亲身感受到了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。如果我们说听说话是师陀接触文学作品的开始，那么，这位不知姓名的说话人，则完全可以说是师陀的文学启蒙师。当师陀成为名作家之后，当回忆到在北方小城中听说话时，他仍然以感激的心情，生动地描述过说话人给他留下的终生难忘的印象，称颂说书的职业，是他最羡慕的职业：“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书，即使现在，我仍会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，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——什么英雄，什么将军，什么学者，什么大僚，全由他去！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，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，毫不踌躇地写上——说话人，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！”①

民俗是作家观照人生的重要手段，也是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载体。打开不少河南作家的作品，我们看到：从婚丧嫁娶到求神拜佛，从生儿育女到过年过节，从人物的称呼到衣着打扮，从农舍的布局到人物的习惯性动作，不论是作者粗线条的勾勒，还是细针密线的工笔，都是地地道道河南化的。作品中活跃着的人物，他们的声音、容貌，甚至他们的苦乐心情，作者都以河南人感到亲切的方式展示了出来。在民俗描写中，婚俗和节日礼俗的描写，在《黄河东流去》和《李自成》中最为精彩。在人类生活中婚姻总是最富有民族特色，保留着较多的民族文化积淀。《黄河东流去》中声情并茂的水上婚礼一章，既表现了古老中原婚俗的民族亲和力，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原农民在灾害面前的精神状态。灾害是如此的深重，以致在举行婚礼时人们为招待客人吃一顿饭而犯愁。最后还是靠

① 《说书人》，《芦荻散文选集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。

风英父亲马老汉带来的十几个蒸馍缓解了危机。灾害把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,他们仅有的是求生欲,以及与困难斗争的勇气。这是中原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。通过民俗描写,实现了作家和读者心灵上的接近与沟通。

以河南为中心地区所构成的中原文化生态空间,其生动活脱、富有生命力的农民语言对河南作家的影响最为突出。或者说这不只是一处影响,作家本身多是出生于农村,甚至本人就是农民。姚雪垠、李準都曾经多次忆及他们学习农民语言的情景。姚雪垠说:大概是1934年的夏天,我因为沉重的吐血病离开北平,路上辗转耽误,直到秋天才回到故乡。在故乡的七八个月中我既不能写作,也不能读书,天天只有睡眠和吃药。无聊的时候我便读一读世界语,或把故乡的口语记录下来。日子久了,搜集的语汇多起来了,便按着编词典的方法把所搜集的语汇编写在笔记本上,题名曰《南阳语汇》。这工作虽然没有做到完成,但却得到了极大益处。从此真正地认识了口语的文学美,那美是在它所具有的现实的深刻性,趣味性,以及它的恰当,真切,素朴与生动……这些口语里渗透着无数的无名天才的心血,这里也包括有宝贵的启示,启示一个文学家应该怎样去创造语言,形容事物。^①

李準的创作受惠于豫西农民语言,以及他对当地民间艺术形式的挚爱。他说:“我首先是学民间戏曲说唱的流畅和明快。像河南豫剧、曲子、坠子等艺术形式,都是叙述味道很浓,而又朴实流畅的。”^②在学习农民语言的基础上,在创作实践中,一些河南作家的创作视野有着程度不同的开拓,姚雪垠学习列夫·托尔斯泰,师陀

① 《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》,《中原文化》1941年10月15日第1卷第1期。

② 参看《答〈文学知识〉编辑部问》、《我怎样写〈不能走那条路〉》等文,《李準全集》第5卷,九州图书出版社2001年版。

学习梅里美,李準学习福楼拜、阿·托尔斯泰,都有程度不同的收获。80年代以后崛起的河南新秀,在思维能力、艺术积累诸方面,更有着较前代作家明显的优势。他们将决定着中原文化圈整体文学品质的未来。

民间艺术施于河南作家的影响,当然也有挥之不去的农业文明的阴影。戏剧《朝阳沟》主人公所向往的,不是都市的现代文明,而是建立在个体简单劳动基础上对于穷山沟生活的诗化。师陀带有经典性质的小说《灯》,表现了都市文明和农业文明不同的鲜明特征:都市高楼林立,霓虹灯闪烁,而中原小城都仍然要靠煤油灯照明。作者笔下的卖油(煤油)郎,精通经营之道,在贫困和落后的农业文明中陶醉,怡然自得。其中,也分明有着作者本人对故乡农业文明割舍不断的依恋。对于许多河南作家来说,创作思想深度的开拓,有赖于心态的调整,对中原农业文明有更清醒的继承和告别(或曰超越)。

文学生存形态:一片葱绿的灌木丛

20世纪的河南文学历尽曲折。它经历了从文化中心衍变为文化边缘的冷落,较长时间处于因为战乱而作家星散的萧条困境,有过在左的思潮干扰下创作的趋时与苍白,临近世纪末才有豫军的崛起带来的初步繁荣。概而言之,20世纪的河南文学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,在艺术上有所积累,有所创获。但是,整体而言,20世纪的河南文学,还只是一片郁郁葱葱,生机勃勃的灌木丛,而没有生长出顶天立地的大树。我们没有诞生大师级的文学巨星。在20世纪末各类文学经典作家的排名中,河南文学总是处于缺席的位置,这和古代中原文化的兴盛、辉煌,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古代的中原文化和中原文学,光华、葱绿、轻盈、明亮、飞动、安详,这里不仅是作家活动的中心地区,而且是

道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杂家和纵横家的诞生地，有成就的文学家不胜枚举。

中原文化从文化中心走向文化边缘，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。仅就文学而论，如下因素对其发展产生着明显的负面影响：

第一，中原文化在发展进程中，对自身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，即理性批判精神。即使远在古代，自恃为天下之中、不思进取的文化保守性，就一直和中原文化的辉煌相伴相生。直到 20 世纪初，《河南》杂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：中原人眼光狭隘，作计不远。自幸居中国腹部，他省虽亡，河南不至同归于尽，冀享太平之庸福。与中原文化顽强生命力相伴的顽固的保守性，因循守旧的历史观念，是制约 20 世纪河南文学取得成就的潜在因素。

第二，从作家的文化构成来审视，可以明显地看到河南作家文学素养整体上的欠缺。河南作家一般学历不高，知识结构相对贫乏，艺术准备不足。即使在创作过程中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而自觉补课，终究比较零碎，以致受时间所困或缺乏足够的自觉而最终造成一种限制。这些作者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，艺术视野不够开阔，写作资源不能多方获取。当有限的生活素材和情感体验消耗之后，创作就失去了底气，后劲不足，难以创作出底蕴丰厚的作品。

第三，和第二紧密相连的，这些作者虽有创作敏感，但缺乏思想深度，主体意识不强，甚至把紧跟趋时视为自己的使命，因而一些作品可能会带来及时配合任务的轰动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则是作品艺术生命过于短暂的尴尬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河南文学发展缓慢、精品不多的主要教训也许就在这里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一批批青年作家从中原文坛脱颖而出，预示了 21 世纪河南文学新的振兴时期的来临。在充分反思、并尊重 20 世纪河南文学发展所积累的各种艺术经验（包括教训）的基础上，参天的文学之树也许会从文学的灌木丛中破土而出。

余 论

末了是关于本书编写的一些说明。

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,地缘与作家关系研究不应只是一味罗列作家与本土先贤的精神联系,而在于把研究从显在联系转向潜在影响研究,“实际上,作家在其幼年至青少年时期,更多的受到的是所在地域文化的潜在影响,他尔后产生的明确的乡邦文化意识,即直接发孕于这种潜在影响。”^①本书的作家研究,力求使作家的地缘研究不至于表面化,对精神中原的特性,并不刻意求之,如厘定若干所谓规律,寻找出某个铁定的答案。精神中原的特性,存在于中原文化、中原文学自身,体现在中原作家的创作和研究者的论著里。我们只是试图通过作家的个案分析,感悟到他们作品所蕴含的某些共同的,甚至是若明若暗长远存在的东西。20世纪以来,中原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已经被彻底打破。在广泛交流中出现了的互补与趋同趋势,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地域的差异性。但在更深层次上存在着的中原文化特质远不会轻易消失。

我们承认地域的差异性,并非主张为创作人为地划定疆界。地域文学研究应该永远是一个开放系统。事实上,文学创作早已从固定的地域溢出。承认差异,才有可能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。鲁迅说过:“缺点可以改正,优点可以相师。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,南人北相者贵。我看这并不是妄语。北人南相者,是厚重而又机灵,南人北相者,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。昔人之所谓‘贵’,不过是当时的成功,在现在,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。这

① 陈方亮《地缘:文化之链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5年第3期。

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。”^①归根结底，地域文学研究也正是为文学寻找的一条“自新之路”。

本书所关注的，既有豫籍作者，也有虽非豫籍、但曾经在这里生活并从事创作的作者，可也并非 20 世纪中原文学世界的全部景观。或者换句话说，这本小册子，我们并不求全。本书当然不能承担 20 世纪河南文学史的编写任务。我们只是有所选择，如严家炎所说，以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、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，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，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；或者虽有“独特的印记”，然我们目前还感悟不深；或受视域所限，当下未能拜读的作品，均待俟诸来日。

我们还特别感到不安的，是旅居海外的诗人如痖弦，国内作家如白桦、王怀让等多位，或因撰稿人忙于他务未能践约如期惠赐大作，或因始终没有寻觅到理想的撰稿者，均未能在本书中与读者见面。我们始终保有出版续集的奢望，但愿将来给我们以补救的机会。

这篇序言该结束了。让我们再次惴惴不安地吐露心迹：直白地讲，《精神中原》乃是一种文学省情研究。我们不想粉饰，却愿提醒。河南主事者，以及所有关心此问题的同仁和读者，倘能于饭后闲暇之时翻上两页，其中的片言只语，果真还会在思路上小有触动，我们将会获得一种成功的快慰。

2001 年 10 月 8 日于开封苹果园寓所

^① 《北人与南人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卷第 436 页。